

维持的悖论：一个关于文化观念操作性衰退的自噬机制模型

作者 胡志英 · SDE 学员 · 约 2.5 万字 · 德麦国际 SDE Universes

一个观念为维持公共可见度而进行的核心活动——争论、阐释、制度化传播——恰恰是其操作性内核的天敌；系统越用力维持公共生命，操作生命衰竭得越快。维持与衰退，是同一动作的两种产出。

摘要

本文识别并理论化了一种普遍存在却未被充分概念化的社会机制：一个文化观念为维持其公共可见度而进行的核心活动，会系统性地窒息该观念原本旨在培育的操作性内核。通过对“知行合一”这一中国哲学命题五百年概念演化史的深度案例分析，本文提炼出“封装性维持”（Encapsulated Maintenance）这一中程理论模型。该模型揭示了三个相互咬合的亚机制——语义位置的持续占据与操作结构之间的异步脱耦、公共争论对异质性身体经验的免疫式排异、以及修复规则被认知系统反身性覆盖——如何构成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本文论证，这一机制并非“路径依赖”或“内卷”等既有概念所能充分解释，因其揭示了维生动作本身的功能性反转：系统越是用力维持其公共生命，其操作生命便衰竭得越快。本文进一步给出了一套排除了“资源总量不足”这一最强竞争假设的、可操作的证伪条件，并在教育学、组织行为学、心理治疗等五个领域检验了该机制的经验同构性。这一理论模型为理解文化传承中的功能性退化现象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并指明了不同于“加大投入”的干预方向。

关键词：知行合一；操作退化；语言封装；制度自噬；中程理论

1 引言

1.1 一个五百年的悖论

1508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提出“知行合一”这一命题。此后五百年间，它始终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富生命力、也最令人困惑的观念之一。其生命力表现为：从晚明讲学运动到当代企业管理培训，从新儒家哲学论争到教育改革的标语口号，“知行合一”从未退出公共话语的核心区域。然而，其令人困惑之处恰恰与这种持久的公共可见度相伴而生：一个如此高频地被讨论、被阐释、被制度化传播的命题，在操作层面却似乎始终未能兑现其字面承诺——使“知”与“行”真正合一。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落差，那么增加实践环节、强化行动导向便应能有效弥合。然而，数百年的经验表明，每一次“补回实践”的努力——无论是晚明的实学转向、清初的经世致用运动，还是当代教育中的“实践教学改革”——都未能阻止“知行合一”再次被卷入下一轮更精致的语言争论之中。更值得追问的是：维持这一命题公共生命的那些核心活动——争论、阐释、制度化传播——是否本身就是造成其操作性衰退的原因？

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1.2 既有解释及其盲区

对于“知行合一”为何难以在操作层面兑现，现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解释路径。

第一种路径可称为“哲学障碍论”。持此观点的学者（如Chen, 2004; Liu, 2010）倾向于认为，“知行合一”本身包含了深刻的哲学疑难——例如“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内在张力、王阳明晚年对“无善无恶”的阐发与其早期工夫论主张之间的不一致——这些内在的理论困难使其难以转化为清晰的操作指引。然而，这一解释存在一个根本难题：任何在公共领域持续存在五个世纪的概念，都不可能是“未被理解”的概念。实际上，“知行合一”可能是中国哲学史上被阐释得最为充分的概念之一。如果问题是“理论不够清楚”，那么持续的阐释应能使它日益清楚，但事实恰恰相反——阐释越多，其在操作层面的不确定感似乎越强，而非越弱。

第二种路径可称为“制度化异论”。这一路径（如Zhang, 2012; Wang & Li, 2017）借鉴制度主义理论，认为“知行合一”在进入教育体系、官僚考核系统、企业培训产业等制度性场域后，经历了不可避免的“制度化异化”——原本旨在启发个体内在转化的实践哲学，被改造为可量化、可考核、可标准化的知识产品，从而丧失了其操作性内核。这一解释触及了制度化过程的核心困境，但它倾向于将“异化”视为制度化的外部效应，而非追问：制度化是否恰恰是这一观念维持其公共生命的必然方式？如果是，那么“反对制度化”便不是一个可行的修复路径，因为它等于要求这一观念放弃其公共存在。

第三种路径可称为“语境变迁论”。这一路径（如Huang, 2015; Zhou, 2019）强调，“知行合一”诞生于明代心学运动的特定语境——彼时的“知”与“行”指向的是儒家道德实践的具体场域（如孝悌、为政、讲学），而当代社会的知识-行动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这一命题的操作性衰退并非内部机制的失败，而是其适用语境已然消逝。这一解释合理地指出了历史语境的重要性，但它无法解释一个对称的现象：为何在现代语境中仍有一些传统实践技艺（如中医的某些诊疗技术、传统工艺的师徒传承）能够相对完整地保有其操作性内核？如果问题是“语境变了”，那么所有传统观念都应经历同等程度的操作衰退，但事实并非如此。

1.3 本文的核心命题

本文提出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不追问“知行合一蕴含着怎样的哲学内涵”，也不追问“制度或语境如何侵蚀了它”。我们追问的是一个更根本的机制问题：一个观念在公共领域中的维生方式，与其操作内核的维持条件之间，是否存在结构性的冲突？

本文的核心命题是：存在一种尚未被充分理论化的社会机制，我们称之为“封装性维持”。这一机制的核心特征在于：系统为维持其公共可见度而进行的那些核心活动——语言争论、制度化阐释、公共传播——恰好是操作性能（即非语言的、以身体为载体的实践感知与应激能力）的天敌。这些活动将鲜活的、情境性的实践信号滤除，替换为可流通、可积累、可考核的语言符号，从而在维持系统“外观”的同时，系统性地窒息了其“内核”。由此，系统的坚固外壳与其不可见的内在衰竭之间，构成了一种双向同源的共生关系：前者恰恰是后者的原因。

本文将通过以下步骤展开论证。第二节梳理“知行合一”的概念演化史，提取出其由操作命题向符号标签转型的关键节点。第三节建构“封装性维持”的理论模型，界定其核心概念与内在机制。第四节阐述本文的方法论——一种结合概念分析与跨案例比较的中程理论建构策略。第五节展开详细的机制分析，逐一解剖异步耗散、免疫屏障与反身性覆盖三个亚机制的运作逻辑，并论证其不可还原性。第六节进行跨领域经验检验，将这一模型投射到教育学、组织行为学等五个领域，验证其解释效力与边界。第七节给出该理论的可证伪条件，明确排除了“资源总量不足”这一最有力的竞争假设。第八节总结本文的理论贡献、实践含义与

未来研究方向。

2 文献综述：知行合一的概念演化与解释困境

2.1 明代的生成语境：操作命题的原初形态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初衷，并非意在建构一套新的哲学理论，而是针对当时朱熹“知先行后”论的一个诊断性干预。在程朱理学的框架下，“知”被视为“行”的指引与前提：先有穷理致知，然后方能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王阳明在龙场的“处困”经验使他意识到，这一“先知后行”的序列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演变为“知而不行”——士人终日格物穷理，却将“行”无限期地推迟至“知尽”之后。

因此，“知行合一”在其生成语境中是一个操作命题，而非一个理论命题。它的语义重心不在“知”与“行”这两个概念的逻辑关系上，而在于对一种特定操作状态的描述与召唤：在每一个具体的实践情境中，个体是否能够即时、完整地将知觉判断转化为身体行动，而不经由“先去想想”的语言中介。支持这一解读的关键证据是王阳明本人的教学方式：他不以论文著述为主要载体，而以师徒之间面对面的即时问答、情境中“点化”为教学手段。这意味着，这一命题的原初“载体”不是文本，而是“身体在现场”——教师的身体演示、学生的身体模仿、即时纠偏的身体反馈。

从本文的理论角度来看，这一原生形态的关键特征在于：操作内核（身体的实践感知与应激能力）尚未从语义节点（“知行合一”这一命题的公共话语位置）上脱落。两者共享同一个通道——身体在场的社会互动。

2.2 晚明至清的语义拓展：从操作到阐释的第一次转向

操作命题一旦开始被更广泛地传播，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语言编码的通道。从王阳明去世（1529）到明末清初的一百余年间，“知行合一”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转型：它从一种在师徒面对面互动中被体证的实践技艺，转变为一种在公共论域中被广泛争论、被文字反复阐释的哲学议题。

这一转型在三个层面展开。（1）学派争论：王门后学对“良知现成”与“归寂主静”的论辩，实质上将“知行合一”中的操作性张力转化为概念辨析。争论聚焦于“知”的本体地位、“合”的逻辑性质等形上学问题，而非“如何在面对父亲时即时做出孝的行为”。（2）文本化：王阳明的讲学语录被弟子整理为《传习录》，这一文本化过程使“知行合一”获得了超越面对面情境的传播能力，但也使其脱嵌于原先的身体在场语境。后来的学习者接触的是“文本中的知行合一”，而非“老师身体上的知行合一”。（3）科举化：明清科举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王学虽未成为正统，但其核心概念不可避免地渗入士子的策论与经义写作。“知行合一”成为一种可被考核的知识点，而非一种可被检验的操作能力。

这一转型的后果是语义节点的先发锁定优势的形成。一旦“知行合一”在公共话语网络中占据了一个高可及性的位置，随后任何试图讨论知识与行动关系的人，都不得不引用这一标签——即使他们想要批判或修正它。引用即巩固：每一次引用，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在客观上强化了该标签的公共可见度。

2.3 二十世纪的制度化：第二重封装

二十世纪，“知行合一”经历了第二次关键转型：从学术论域进入现代制度体系——尤其是教育体系与政治话语体系。这一转型使其公共可见度达到新的高度，但也完成了对操作内核的制度化封装。

在教育领域，以“知行合一”为名的教学改革运动此起彼伏。然而，“推行知行合一教育”本身就包含一个结构性悖论：一旦“合一”被设置为需要由制度来组织达成的目标，它就被不由分说地纳入了“知先行后”的逻辑——先有关于“合一”的教学设计（知），然后由师生去执行（行）。这正是“知行合一”变成其对立面的机制。

在政治话语领域，自二十世纪上半叶起，“知行合一”被纳入思想改造与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中。这一命题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功能：不只是描述个体修养的理想状态，而是成为一种可以被官方阐释标准化、可以被纳入政治学习材料的规范性话语。阐释的标准动作是将“知行合一”与特定的政治正确的论述对接——这一过程在维持其公共可见度的同时，进一步将其操作性内核封入层层叠叠的语言防护层。

2.4 当代的符号性存活：争论即生命的梦幻

进入二十一世纪，“知行合一”的公共可见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在管理学培训、心理咨询、教育创新、大众励志等各个领域被广泛引用。然而，这种表面的繁荣掩盖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它越是高频地被提及，其操作内涵就越空洞。

这一状态可以被精确地描述为“符号性存活”：命题所占据的语义节点依然活跃（持续有争论、引用、阐释发生），但该节点所维系的，只是命题的“声音”而非其“作用”。每一次引用都在重复和加固这个声音，但同时也多盖了一层新编码，把早已微弱不堪的操作信号又包严了一点。更讽刺的是，这种空洞化本身又成为下一轮争论的最佳原料——人们继续争论“究竟什么是知行合一”“为什么它似乎难以实践”“它的现代价值何在”，这些争论本身就是维持该命题公共可见度的燃料。争论不休的真正后果，不是“保持了其生命力”，而是持续制造出“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认知记录，从而永久地替代了“我是否此刻正在身体上做到它”的即时指认。

2.5 既有解释的盲区：一个共同的遗漏

回顾前述三种解释路径——哲学障碍论、制度化论、语境变迁论——可以看到，它们各自捕捉到了“知行合一”退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侧面，但它们共同遗漏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造成退化的动因，究竟是某种外部力量的侵蚀，还是命题为维持自身公共生命而必然采取的维生方式本身？

哲学障碍论将问题定位于理论内部的困难，但忽略了：持续的阐释活动本身可能正是阻止这些困难在操作层面被“绕过去”的力量。制度化论将问题定位于制度对活力的压制，但忽略了：制度化是一个观念在大规模社会中获得公共存在的唯一途径。语境变迁论将问题定位于历史语境的消逝，但忽略了：维生方式（语言争论与制度化）的选择，而非语境的变迁本身，可能才是操作内核被替换的真正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精确定位既有研究留下的缺口：尚缺乏一个中程理论模型，能够同时在结构、过程与时间三个维度上，解释一个观念为维持自身公共可见度而进行的核心活动，如何系统性地导致其操作内核的衰退。这正是本文试图填补的缺口。

3 理论框架：封装性维持机制

3.1 核心概念定义

本文的理论建构建立在以下核心概念的精确操作化定义之上。

操作性内核：指一个观念所包含的、以身体为载体、以非语言或前语言的实践感知与应激能力为主要构成的实践维度。这一概念区别于“理论知识”或“命题知识”：理论知识可以在语言符号系统中被传递和检验，而操作性内核的传递依赖于身体在场的情境互动——演示、模仿、即时纠偏。操作性内核的衰退表现为：个体“知道这一观念在说什么”（可语言表述），但“无法在具体情境中即时做出对应的身体反应”。

语义节点：指一个观念在公共话语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一个语义节点的“可及性”取决于该节点被引用、争论、阐释的频率与广度。高可及性语义节点具有“引力效应”——任何围绕相关议题的讨论，都倾向于被吸引至此节点，以之作为参照或靶子。

语言封装：指将操作性内核转译为语言符号，从而使其能够在语言系统的规则下被积累、传播、评价与制度化的过程。语言封装本身是社会传播的前提条件——没有语言编码，一个观念无法进入公共领域。然而，语言封装具有一个结构性的副作用：它在传递“关于某物的信息”的同时，滤除了其编码对象特有的、无法被语言符号捕获的那部分——正是操作性内核本身。

公共呼吸：比喻性概念，指一个观念为维持其在公共话语网络中的可见度而进行的所有语言活动——争论、阐释、制度化教学、大众传播——的总和。

封装性维持：本文的核心概念。指这样一种机制——一个系统的公共呼吸动作（语言争论、制度化阐释、大众传播）恰好构成了一种封装操作，将系统的操作性内核包入层层语言外壳之中；系统越是用力呼吸以维持自身在公共领域的可见存在，封装就越厚，发自内核的操作性信号就越微弱。维持与衰退之间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同一动作的两种产出：语言代码在传递观念的同时，也是操作性信号的隔音材料。

3.2 三个亚机制的咬合关系

封装性维持不是一个单一机制，而是三个亚机制在不同维度上相互咬合构成的闭合循环。

亚机制一：语义位置与操作结构的异步耗散。这一亚机制概括了S维度与E维度之间的关系。当一个观念通过语言争论和制度化获得了高可及性的语义节点后，该节点开始独立于操作结构运作。大量注意力与资源被吸引至语义节点（围绕观念的话语生产），但这些输入无法经由操作结构转化为操作性的输出——因为操作结构需要的不是语言符号的输入，而是身体在场的情境互动。结果是：语义节点的活跃度与操作结构的活性在时间上发生背离。前者持续膨胀，后者持续萎缩。语义节点的引力效应使这一背离自我强化：越来越多的语言活动被吸附到节点上，进一步挤占了可能会发生操作性活动的注意力和时间资源。

亚机制二：公共争论的免疫屏障。这一亚机制指明了亚机制一得以稳固运行的微观机制。社会系统对一个观念最活跃的“维生动作”是争论——不同阐释立场之间的辩难、修正、综合与创新。争论看似是探究真伪，实则具有一个未被充分识别的功能：每一次争论的参与者都会在认知系统中生成一个“我理解了这个问题”的记录，这一记录本身构成了一道免疫屏障——它使个体预先免疫了对自身身体信号的注意。换言之，争论替代了实践。一个人一旦在争论中形成并表达了一种立场，其认知系统便会将该观念标记为“已处理”，从而降低了进入真实操作性试探的动机。因而，每一轮的争论，不只是在批判旧说、建立新说，同时也是在参与者内部建造一堵新的、把“理解”挡在“会做”门外的高墙。

亚机制三：修复规则的反身性覆盖。这一亚机制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诊断出前两个亚机制之后，针对性的修复努力仍难以奏效。当一种修复方案（例如设计一套反规则来截断语言封装、强制实践先行）被提出时，该方案本身必然以语言形式呈现。参与者阅读方案、讨论方案、理解方案的“设计意图”——这一过程正是语言封装的标准动作。结果是：“我懂了这套修复方案”的认知记录在方案尚未被执行之前，便已覆盖了方案旨在创造的操作性试探窗口。修复意图被系统用其自身最擅长的维生动作——语言编码与理解——吸收并无害化。这构成了第三个咬合齿轮：每一次“如何修复”的讨论和方案设计，本身又为亚机制一和二注入了新的燃料。

3.3 与既有理论概念的区分

为明确定位本文的理论贡献，有必要将“封装性维持”与几个表面相似但实质不同的既有概念进行区分。

与“路径依赖”的区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核心逻辑是：早期的一次偶然选择导致了某种制度或技术的锁定，后续的发展轨迹被初始条件约束，呈现出自我强化的特征。封装性维持与路径依赖有三点本质不同：（1）路径依赖强调初始选择的锁定效应，而封装性维持强调每一个当下的维生动作都在重新关门——不是一次性的历史锁定，而是持续的、主动的关门动作。（2）路径依赖通常归因于转换成本、网络外部性等外部约束，而封装性维持的驱动力来自内部——维生动作本身恰好就是关门动作的燃料。（3）路径依赖无法解释“为什么争论越多反而空洞越深”——路径依赖会说“因为初始选择锁定了轨道”，但封装性维持揭示：每一个当前的争论都在加深空洞，维持动作与衰退是同源的，不是先后关系。

与“内卷”的区分。内卷（Involution）通常指在一个固定的边界内增加投入而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封装性维持与内卷的区分在于功能反转而非收益递减。内卷的典型图景是“精耕细作”——投入增加，产出虽递减但仍为正。但封装性维持描述的是维生动作本身发生了功能反转：投入得越多，系统的核心功能不是在递减，而是在变成负数。争论越多，“知行合一”的操作可及性不是渐进下降，而是每一步新争论都在主动形成新的认知覆盖。这不是内卷式的精耕细作，而是自毁式的自我消化。

与“替代学习”的区分。替代学习（Vicarious Learning）指通过观察和反思他人的经验进行学习，而不必亲自体验。封装性维持揭示的与之不同：（1）替代学习中的“观察”仍可能保留操作性维度（如通过观看示范学习技能），而封装性维持中发生的替代是“对自身经验的公共论述替代了对自身经验的操作性进入”——是一种自指的、封闭的替代。（2）替代学习通常被视为一种有效的学习策略，而封装性维持揭示的是：公共论述替代操作性实践的过程，是一个无效的但却被系统视为“有效”的封闭循环。

3.4 跨学科理论资源

本理论的建构受益于以下跨学科理论资源的启发，但本文的论点并不依赖于对这些资源的具体认同，而是独立地命名了一个新的机制。

认知科学中的语言遮蔽效应。Schooler与其合作者（1990，2002）发现，对非语言经验（如面孔记忆、味觉体验、复杂动作）的语言描述，会损害后续对该经验的非语言识别与操作能力。这一发现提供了封装性维持的微观认知基础：语言编码不仅传递信息，也会覆盖和取代非语言的原始表征。从认知科学借用到本文的论域，其同构性在于：在感知记忆层面，语言覆盖动作记忆；在文化传承层面，公共话语覆盖操作内核。两者的有效边界在于“任务是否依赖难以语言化的工作”。如果公共话语中的观念其操作内核正是这种难以语言化的能力，则上述类比有效。

社会学中的制度化悖论。Meyer与Rowan（1977）、DiMaggio与Powell（1983）等新制度主义学者指出，组织为了获得外部正当性而采纳的制度化结构，常常与其核心的技术效率需求发生脱耦。本文的理论延续了这一洞察，但做出了两点推进：（1）不止是脱耦，而是维生动作本身即是脱耦的持续再生产机器；（2）制度化悖论通常指向形式结构与技术活动之间的分离，而封装性维持揭示的是维生行为本身的功能反转。

4 方法论

4.1 研究设计：概念分析与中程理论建构

本文采用的研究策略是以概念分析为引擎、以跨案例比较为检验的中程理论建构。这一策略的选择依据如下。

本文的目标不是对“知行合一”的思想史做全面的经验描述（那是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的任务），也不是从一手实证数据中检验一个因果假设。本文的目标是：从“知行合一”这一典型案例中，提炼出一种具有一般性的社会机制，将其概念化为可操作的理论模型，并指出检验该模型的经验条件。这一目标决定了最合适的方法是概念分析——通过对案例的深度解构，识别其内在的过程逻辑，并将其抽象为可迁移的理论语言。

然而，单一案例的局限在于：由此提炼出的机制可能仅仅是该案例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因此，本文将“知行合一”案例视为理论生成的引擎而非唯一的经验支撑。机制模型建立后，将在五个跨领域案例中检验其解释效力和边界条件，以确保该理论模型不是对单一案例的过度拟合。

4.2 为什么选择“知行合一”作为核心案例

选择“知行合一”作为核心案例，并非因为它是一个方便的例子，而是因为它构成了一个极端案例——在此案例中，本文所要理论化的机制以一种放大的、浓缩的形态展现出来。

- （1）时间跨度极端：五百年的概念演化史为观察“维生动作如何累积性地生产退化”提供了足够的时间纵深。大多数类似现象在较短时间内难以清晰呈现这一机制的全貌。
- （2）公共可见度极端：“知行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公共可见度最高的哲学命题之一，这为观察“高可见度下的操作衰退”提供了充分的经验材料。
- （3）操作内核明确：“知行合一”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操作性”的命题——它的内容（知与行的关系）恰好与本文分析的维度（操作内核 vs. 语言封装）高度相关。这意味着，机制在此案例中既是被分析的对象，也是材料本身指向的方向，这种“自指涉”的结构有助于清晰地呈现机制逻辑。

4.3 分析步骤

本文的分析遵循以下步骤：

- 步骤一：概念解构。将“知行合一”五百年演化史中的关键转折点识别出来，提取出操作性内核与语义节点之间关系变化的轨迹。
- 步骤二：机制建模。基于对核心案例的分析，建构出封装性维持的理论模型，明确定义其核心概念、内在结构与运行逻辑。
- 步骤三：不可还原性检验。证明该模型不能被既有理论概念（路径依赖、内卷等）充分解释。
- 步骤四：跨领域经验检验。将模型投射至五个不同领域的案例，检验其解释效力和边界条件。
- 步骤五：证伪条件设计。提出明确的可证伪条件与操作化检验方案，明确排除最有力的竞争解释。

4.4 方法的局限

本文的方法有三个需要诚实承认的局限。（1）本文的核心案例是思想史文本，而非一手的行为或组织数据。这意味着本文提供的不是因果关系的统计证据，而是对一种机制的识别与理论化。该机制是否成立，最终的检验来自后续的实证研究——这正是本文在第七节设计可证伪条件的用意。（2）跨领域案例的选取具有理论驱动的选择性——作者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可能符合预期机制模式的案例。这一选择偏差需要在未来通过更系统的、包含负面案例的检验来纠正。（3）本文的理论建构主要基于汉语文化圈中的案例，其跨文化效度有待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检验。

5 分析与讨论：封装性维持的机制解剖

5.1 异步耗散：公共可见度与操作结构的时间脱耦

封装性维持的第一个亚机制是异步耗散。这一机制描述了系统的一个结构性特征：一个观念在公共话语网络中所占据的语义节点，与该观念的操作性结构之间，在时间维度上发生持续加剧的背离。

机制的逻辑。当一个观念首次进入公共领域时，其语义节点（该观念在话语网络中的位置）与其操作结构（承载该观念运作的社会实践与身体技艺）通常共享同一通道——如同早期“知行合一”在王门师徒面对面的社会互动中被传递与维持。然而，随着该观念的公共可见度提高，维持其语义节点活跃的“燃料”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需要身体在场的实践互动，而是可以在去身体化的媒介中流通的语言符号——争论、阐释、制度文本。由此，语义节点开始获得一种独立于操作结构的生长动力。它吸引注意力、资源和认知能量，但这些输入无法“渗透”入操作结构——因为操作结构的再生产需要的是身体在场的情境实践，而非语言符号的积累。

自我强化的循环。这一脱耦一旦发生，便具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公共可见度的提高吸引更多的语言活动涌向该语义节点，增大了该节点的话语“引力”。增大的引力进一步抽走了原本可能投向操作结构的注意力和时间，从而使操作结构因缺乏实践投入而持续萎缩。萎缩后的操作结构更难接入来自语义节点的输入，使得语义节点的“消化不良”日趋严重——大量语言活动围绕一个日益空洞的操作内核旋转。而这些旋转本身——争论、阐释——又被系统识别为“该观念还很活跃”的证据，从而激励更多的维生活动。

经验指示器。在“知行合一”案例中，异步耗散的经验指示器包括：（1）该命题的引用频率与操作指南产品的多元化程度持续上升，但严肃的实践共同体报道的“可操作性体验”并无改善；（2）对该命题的哲学阐释日趋细化与专门化，但这些细化对非哲学专业的实践者几乎不产生可辨识的行为改变；（3）“知行合一”的教学材料篇幅持续增长，但教学效果——学生能否在情境中即时合一——未见相应提升。

5.2 免疫屏障：公共争论的排异功能

异步耗散解释了一旦脱耦发生，脱耦为何会持续扩大。但异步耗散并未回答：为什么语义节点需要持续吸入语言活动？这些语言活动在系统的运行中究竟起到什么功能？免疫屏障机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公共争论的系统功能不是探究真伪或修复脱耦，而是生成“我懂了”的认知记录，对可能激活操作性试探的信号进行预先免疫。

机制的逻辑。社会系统中围绕一个观念的反复争论，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是在消耗系统的认知处理总容量。如果系统的认知处理容量是有限的，那么投入到争论中的认知能量，便无法同时投入到操作性试探中——后者的认知过程依赖于身体信号的接通，而非概念推演的推进。更重要的是，争论不仅消耗了认知能量，它还制造了一种强大的副产品：参与者在争论过程中会在自身的认知系统中生成“我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的元认知标记。这一标记具有免疫功能——它将后续来自身体信号的、可能与这一标记相矛盾的冲撞预先解释为“已经想过了”的已知信息，从而阻止了这一冲撞进入更深层的行为修正回路。

“理盖层”的隐喻。“知行合一”案例如同一个活生生的地质学剖面。每一代学者都在这上面加上一层新的解释岩层。新来的学生不再直接听到王阳明的声音，而是透过这累积了五百年的阐释岩层去“听见”。每一层阐释都声称在帮人“回到”原点，但讽刺的是，每一层新阐释都使得回到原点的地层更厚。学习者不再能与原材料直接碰面，他们只能与前人解读的产物碰面，而那些解读恰好是构成免疫屏障的建材。

与异步耗散的咬合。免疫屏障构成了异步耗散的动力引擎。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争论（免疫反应），语义节点得以维持其高可见度，而这种维持本身又在产生新的免疫记录，使操作结构的修复信号更难穿透。两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免疫屏障是异步耗散的维持泵——每一次免疫反应都既巩固了语义节点的位置（使公共可见度维持甚至上升），又在其上叠加了一层新的免疫记录（使操作结构更难被接通）。

5.3 反身性覆盖：修复规则的自噬困境

异步耗散揭示了结构上的脱耦，免疫屏障指明了脱耦如何被争论活动持续再生产。但这两个机制合在一起，引出了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如果系统内部有人识别出了这一机制，并尝试设计针对性的“反规则”——例如，强制执行“先做再讨论”的实践规程，或者设计“必须用身体演示而非语言解释”的考核方式——这些修复努力能否打破闭环？反身性覆盖机制的答案是：修复规则本身将以语言编码的形式被纳入系统，并在执行之前被系统的维生动作覆盖，从而转化为维持闭环的新燃料。

机制的逻辑。任何旨在截断语言封装、恢复操作性实践的制度或规则，都必须以语言为载体被阐释、传达和学习。参与者学习这些反规则时，必经的阶段是“理解反规则的设计意图及其操作步骤”。这一“理解”过程恰好就是制造免疫记录的标准动作：参与者的认知系统生成“我懂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标记，而这一标记预先免疫了反规则试图创造的那种不舒适的操作性试探。由此，反规则在尚未被严格执行之前，就已经被安全地封装在认知系统中。更糟的是，因为参与者感到自己“已经理解了”，组织也可能产生“我们已经采取了修复行动”的制度性满足感，二者共同构成一个高度完美的闭环——修复的努力不仅失败，而且失败得很安静，以至于没人意识到失败。

时间维度上的纵向累积。反身性覆盖不仅发生在单次修复努力中，还发生在时间轴向上。历史上每一次试图“回到原初操作性状态”的改革运动，都在事后被证明为下一轮更精致的语言争论提供了素材和弹药。每一次改革的失败，不是被总结为“方向根本错了”，而是被总结为“上次做得还不够”——需要更多的讨论、更精密的方案设计。这恰恰是系统自我维持的最高明之处：它将每一次修复失败都重新吸收为“未来可以做得更好”的叙事，从而将修复能量永久地锁定在内部，永不突围。

5.4 三个亚机制的咬合闭环与功能性反转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亚机制如何咬合成一个闭合的循环：

异步耗散（亚机制一）制造了一个结构性的脱耦：观念在公共话语中的位置持续膨胀，但其操作性内核持续萎缩。这一萎缩制造的“空洞感”与“实践焦虑”成为该系统最强劲的公共争论燃料。免疫屏障（亚机制二）接过了这些燃料，将其转化为持续的争论活动——这些争论越是活跃，越是在参与者认知系统中生成“我处理过这个问题”的免疫记录，从而在微观层面进一步将本可能导向实操的注意力引回概念辨析。反身性覆盖（亚机制三）则确保：任何针对前两者的修复努力，在其介入系统的那一刻——即以语言形式被提出、讨论、制度化——就已经被系统最擅长的维生动作吸收，变成第三亚机制的维持自身的新养料。

这一咬合闭环指向一个具有根本性的判断：在这一系统中，修复不是一个可以单独设计的、从外部注入的程序。修复的意图和修复动作的启动本身，就是系统自我维持闭环的关键养料。这就是功能性反转的全部含义——维持的动作直接关闭了修复的通道，而修复的动作又重新开启了维持的循环。

5.5 对竞争解释的排除与不可还原性论证

为确立“封装性维持”作为一个独立的新理论概念，需要论证它不能被既有的解释充分涵盖。

第一，它不是“资源总量不足”。最有力的竞争解释是：“知行合一”难以实践，仅仅是因为实践它所需的时间、精力和外部资源不足——人们忙于生计，无暇进行长期的、需要身心投入的修养实践。如果这一解释成立，那么“封装性维持”便是冗余的——“资源不足”足以解释一切。然而，“资源不足”假设无法解释一个关键的经验现象：为何在某些群体中，围绕“知行合一”的讨论、阐释、文本学习（这些同样消耗时间和精力）被大量投入，而实践操作的本源投入却同期下降？如果仅仅是“时间不够”，那么被挤压的应该是所有类型的活动，而不是专门挤掉了非语言的操作实践。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语言活动（讨论、阐释）挤掉了操作性活动（身体实践）。这一选择性挤压无法被“总量不足”解释，而“封装性维持”机制则精确地指出了其根源——语言活动不仅消耗同一份时间预算，还主动制造“已处理”的认知记录来排异操作性试探。

第二，它不是既有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经典形态是：过去的一项选择提高了当前转换的成本，从而使系统锁定在一条次优路径上。但“知行合一”的案例中，关键的关门动作不是在五百年前完成的，而是在过去五百年中的每一个当下被维生动作持续执行的。每一年新出版的阐释著作，每一次新举办的“知行合一研讨会”，都在重新执行关门动作。这不是锁定效应的延续，而是门被一次又一次地关上。

第三，它不是广义的“内卷”。内卷强调在固定边界内追求极致精细而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封装性维持揭示的图景更严峻：对精致阐释的追求并不是在“精耕细作”一块有限的生产空间——它是在持续损毁产生真正产出的那个核心器官。翻译成工程学的语言：这不是在低效率地运转，而是在运转中缓慢地删除系统的核心模块，却保留了全部耗能的外壳指示灯。因而，修复不能是“把指标换一套”或“提高效率”，必须是改变维持系统所用的燃料本身。

5.6 本节小结

封装性维持机制概括了一种普遍存在却未被充分理论化的社会自噬逻辑：系统的公共维生动作，恰好构成对其操作性内核的窒息性封装。三个亚机制——异步耗散、免疫屏障、反身性覆盖——分别从结构脱耦、过程排异与时间累积三个维度解释了这一闭环如何运行、为何坚固、为何修复的内驱力也难突围。

6 跨领域检验：五个经验领域的同构分析

一个中程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解释其赖以生成的核心案例，还在于它能穿透多个经验领域，揭示表面上不相关的现象之间的深层次同构性。本节将封装性维持模型投射至五个不同领域的典型案例，检验其解释效力。

6.1 教育学：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标准化困境

近二十年来，培养批判性思维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流行目标。为此，大量“标准化批判性思维课程”被研发与推广。这些课程配有精心设计的评估量规（rubric）和教案模板，以确保批判性思维这一难以评估的能力可以被“看到”和“提升”。然而，对这类课程的元评估研究（如Abrami et al., 2015）揭示了一个普遍而棘手的结果：尽管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在批判性思维的量规评估上得分有所提高，但在真实的、跨情境的推理任务中，其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迁移极为有限。

封装性维持机制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解释。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操作性内核——在信息不完备、情境高度不确定时，仍能保持质疑、探测预设、暂缓判断并做出更好推理的身体反应惯性（一种思维习性，而非思维知识）。然而，为了维持批判性思维在课程体系中的公共可见度与可考评性，教学与考评过程将其转译为可被语言编码、可被量规评分的“思维步骤”与“论据句式”。这一转译——将思维习性封装为思维套路——恰好是语言封装的标准操作。每一次学生填写量规模板、记忆批判性思维的“五个步骤”，都在其认知系统中生成一个我已具备批判性思维的认知标记，这一标记在所有后续的真实情境中都率先按下了止步键。于是，课程越是精细地教批判性思维，学生就越不可能真正地思维——反而学得极好地表演批判性思维的标准姿态。结构同构：课程的维生动作（教学与依量规考评）精确地关闭了其目标接口（自发的批判性思维习性）。

6.2 医学：抗生素耐药性的演化逻辑

抗生素的发明是现代医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然而，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尤其是非必要的、预防性的广谱抗生素使用——已成为筛选“超级细菌”的进化引擎。一种抗生素越是有效、越是广泛使用，其筛选出的耐药菌株就越快使该抗生素失效。这不是药物本身变弱了，而是使用药物的动作筛选出了能抵抗药物的对手。

这一表面上的生物学现象在机制层面与封装性维持完全同构。抗生素的使用（维生动作）是为了控制细菌感染（维持个体健康）。然而，使用动作本身恰好构成了对耐药菌株的选择压力——越是频繁使用，对耐药菌株的选择强度越大，最终使整个药物类别面临失效的风险。对抗动作本身，不间断地强化了它要对抗的对手。这与“每一次争论都在制造新的免疫记录”在结构上完全一致。两者都是维生动作与其长期目标发生了功能反转。

6.3 组织行为学：流程优化委员会的自噬困境

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一个广泛存在的困境是：为对抗大公司病而设立的“流程优化委员会”或“敏捷转型办公室”，常常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自身成为组织僵化最顽固的源头。这类委员会的初衷是定期审视并简化冗余流程。然而，为了维持其自身在组织中的存在与可见度，委员会需要定期产出“优化方案”——这些方案经由会议讨论、文字化、制度化，本身就在增加新的审批节点与报告要求。最终，旨在消除流程的机构，变成了流程最密集的生产者。

封装性维持的解释框架直接适用。优化委员会通过持续产出优化方案（语言争论与制度化）来维持其公共可见度，然而这些方案的制度化过程本身就在为组织叠加新的语言封装层。修程序的程序本身，变成了最坚固的程序。组织越是用力推“消除僵化”的举措，就越在这些举措中生长出新的僵化。修复程序的结构化存在直接加重了其所要修复的问题。

6.4 城市规划：交通宽马路诱导拥堵的悖论

交通工程学中有一个被反复验证的现象：为缓解老城区交通拥堵而修建的宽阔主干道，在投入使用后，不仅没有缓解拥堵，反而由于“诱导需求”（induced demand）效应，吸引了更多车辆，最终造成更大范围的交通瘫痪。修建更多道路以缓解拥堵的逻辑，在宏观尺度上系统地失败了。

这一案例与封装性维持的同构性在于：为解决拥堵（系统压力）而修建的干道（更大的流量接口），激发了更多的交通流量（诱发了出行需求，等于更多车辆），最终使缓解拥堵的目标通道反被新流量锁死。为解决问题而做的扩大规模的维生动作，直接变成问题进一步恶化的重要机制。

6.5 心理治疗：创伤叙事作为重新整合的阻断

心理治疗中一个备受争议的现象是“病理标签化”：对创伤经历的反复口头叙述和讨论，有时并不带来真正的修复和整合，反而可能把体验固化成一个重复的创伤故事，从而阻断了经由更身体化的治疗手段（例如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或躯体体验疗法）进行深度重新整合的真正通道（参见van der Kolk, 2014的临床论述）。

这与封装性维持的同构在于：为了维持个体对自我体验的认知掌控（维生防御），患者与治疗师共同构建了一个可被语言理解和流通的创伤叙事。然而，这个以语言为核心材料的维持动作，恰好对更深层的、非语言的躯体记忆信号构成了封装。每当这套叙事被复述一次，身体中储存的原始恐惧回路就失去一次被非语言疗法接通和消解的机会。维生叙事越是坚固，被封装在其中的身体记忆就越难突围。

6.6 经验的边界与普适性限制

以上跨领域检验显示，封装性维持机制适用于一系列在形式上共享“维生动作系统性窒息操作内核”这一结构的现象。然而，该模型的普适性亦有其边界。

（1）它不适用于那些操作性内核高度依赖于语言编码的领域（如纯粹的形式逻辑、数学定理的证明）——在这些领域，维生动作（语言阐述）本身就是内核的构成部分，二者不是竞争关系。

（2）它不适用于那些公共可见度低的小规模实践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尚未经历语言封装的结构性压力，可以在身体在场的情境互动中完成大部分传递与维持。

（3）在那些公共维生动作可与操作结构维持一定分离度的制度安排下，该机制的作用程度会有所削弱。这些边界条件需要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进一步精确化。

7 证伪条件：排除竞争假设的检验设计

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分量，取决于它的证伪性——即它是否指明了什么样的经验发现会使它被放弃。本节给出封装性维持理论面对的最强竞争解释，并设计一种能够排除该竞争解释、使本理论接受严峻检验的研究方案。

7.1 最强竞争解释

封装性维持理论面临的最强竞争解释是资源总量不足假设：

竞争假设：操作性内核的衰退并非由维生动作的结构性配比问题导致，而仅仅是因为系统在特定命题上的总投入资源（时间、精力、经费）不足。个体或组织之所以“只说不做”，是因为他们太忙、太累，没有额外的“实践时间”，而“说”（讨论、开会、写报告）则是日常工作的强制性要求，消耗的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注意力预算。如果给予充足的实践时间与资源，操作性衰退就不会发生。

必须强调，这一竞争解释是强有力的——它在直观上非常合理，并且广泛适用于许多“想做但没空做”的日常生活情境。因此，要确立封装性维持理论的独立解释效力，必须设计一个能够明确排除这一竞争解释的检验方案。

7.2 检验设计：控制总量后的结构配比效应

核心思路：在控制个体或系统在特定命题上的总投入时间、精力总量以及外部资源的条件下，检验“用于维持公共可见度的活动占比（如语言争论、文件阐释、制度性学习的时长）”与“操作性敏锐度的衰退速率”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显著的正向剂量-反应关系。

操作化变量：

自变量（关键预测变量）：公共维生活动占比。操作化为——在总投入时间中，用于语言性活动（会议讨论、方案撰写、理论学习、经验交流）的时间比例。

因变量：操作性敏锐度的衰退速率。操作化为——在标准化情境模拟任务中，正确识别非语言实践信号并即时做出恰当身体反应的准确率与速度，在前后两期的变化幅度。

控制变量：（1）总投入时间（控制“太忙没空”的竞争解释）；（2）成员初始操作能力；（3）组织规模与制度化程度；（4）任务复杂度。

假设：

研究假设（H1，本理论预测）：在控制总投入时间与其他协变量的条件下，公共维生活动占比与操作性敏锐度的衰退速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零假设（H0，竞争解释预测）：在控制总投入时间后，上述相关关系消失或显著减弱——即操作性衰退可被完全归结为总投入不足。

研究设计：

采用多点横断比较与纵向追踪结合的设计。选取20-30个涉及同一类“需要操作-语言张力”任务的组织——例如，同一行业中同样推行某项需要“真正上手”的新操作规程的企业。测量它们在为期18个月中：（1）围绕该规程的内部讨论、培训文件、评估材料的耗费时间；（2）同期成员在仿真场景中的情境执行准确率的变化。用多层次模型控制组织层面的混淆变量，重点检验变量（1）对变量（2）的边际效应。

证伪的判定标准：如果统计检验在控制总量后，无法拒绝零假设——即公共维生活动占比对衰退速率没有额外的解释力——那么封装性维持理论被证伪。问题将归因于绝对的投入不足，而非投入的结构性配比问题。

更严厉的纵向证伪条件：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组织——其围绕某项操作的内部讨论与文字评估文件占总工作时间的比例极高（远超同行业平均水平），但经过三年以上的纵向追踪，其一线成员在关键情境的即时决策失误率并未显著高于同行业其他组织——这个实例本身即可作为对封装性维持理论的严峻反例。届时，将有力地证明：封装性维持即使发生，也可以被特定的组织特征有效对抗或消解。

7.3 证伪后的理论调整方向

如果封装性维持被证伪，我们将学到：操作能力的衰退仅仅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而非一种结构性的自噬。这意味着干预的方向将变得极其简单和乐观——仅仅需要增加资源供给或强制性的实践时间配额就行。然而，如果它经得起检验，那么所有基于“加强投入”的方案都将是饮鸩止渴：它们表面上增加了实践时间，但由于总投入中维生活动的占比维持不变甚至随新方案增加，对真正操作内核的压制反而可能加剧。真正的解药，必须指向改变系统用以维持自身的主要材料——扭转将非语言操作体验转译为语言符号以永久储存的惯性。

8 结论

8.1 核心发现的理论凝缩

本文通过深度的概念分析与跨领域比较，识别并理论化了一种普遍存在却未被精确命名的社会机制——封装性维持。该机制的核心是：一个系统的公共维生动作（语言争论、制度化阐释、文本传播），恰好构成对其操作性内核的系统性窒息；系统越是用力维持其在公共领域的可见度与正当性，其赖以呼吸的操作性肺叶便越是不可逆地纤维化。这一机制的坚固外壳与其内在衰竭之间，是一种双向同源的共生关系——前者直接是后者的原因。

本文进一步解剖了该机制的三个亚机制的咬合闭环：异步耗散解释了语义节点的位置膨胀与操作结构的持续脱耦；免疫屏障揭示了公共争论如何制造“我懂了”的认知记录以排异身体信号；反身性覆盖则指明了修复努力自身被维生动作重新吸收、转化为闭环新燃料的纵向深度。这一闭环的有效性是无法被单一视角理解的，它必须从这三个维度同时切入才能浮现出全貌。

8.2 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为理解长期困扰组织研究、知识社会学与教育研究中的一类普遍现象——为什么旨在传递或强化能力的制度行为常常导致所涉能力的消亡——提供了一个更精准的、可证伪的中程理论模型，区别于“路径依赖”“内卷”等既有概念。

第二，本文为观念史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分析维度：不只是关注观念内容的演变或制度对观念的收编，而是关注观念在公共领域中赖以存活的方式本身的结构性和后果。观念的生命与其死亡，可能同出一源。

第三，在方法论层面，本文演示了如何从单一文化哲学命题的概念演化史中，提炼出具有一般社会机制意义的中程理论，并通过跨领域同构分析与严格的证伪设计来夯实其理论分量。

8.3 实践与政策含义

如果封装性维持机制成立，它指向的实践含义是鲜明的，且与常识性的“加大投入”建议正相反。

第一，对于教育领域：不应继续沿着“把核心素养编成更精密的量规和教案”的路径追求改进。真正有效的干预，可能恰恰是在教与学的制度设计中，保留大量不允许被语言考评的身体实践时间，并把“不解释、直接做”固化为组织的正常呼吸节律。

第二，对于组织管理：不应继续增设旨在减少流程的委员会或岗位。有效的干预可能需要将“禁止用语言报告替代行为观察”写进规则，并设定一个“反对语言自我描述”的信号释放装置，让组织的维生信号必须来源于现场行为的即时数据暴露，而不是被多重加工过的文字。

第三，对于文化传承：不应指望通过“推广、普及、进课堂、编教材”来挽救一种处于操作衰退中的传统实践技艺。这些举措本身就是语言封装的加强版，可能只会加速其操作内核的最后熄灭。真正的保护，是为其保留一个非语言的、身体在场的实践共同体的珊瑚礁——不在媒体和教材里，在具体的人的肉身传递里。

8.4 研究局限

本文提供的是一个理论模型的建构与初步检验，而非最终的实证确认。其局限包括：核心案例是思想史文本，因果论证的力量来自机制的逻辑自洽与跨领域同构的合理性，而非一手数据；跨领域检验的案例数量有限且经过理论驱动的选择；模型的跨文化效度尚待检验；尽管提供了可操作的证伪条件，但其真正的理论地位取决于未来实证研究能否在控制条件下复现或否定本文提出的结构配比效应。

8.5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本文的理论建构，我们提出以下五个可生长的未来研究纲领。

第一，定量检验结构配比效应。严格按第七节的证伪设计，在多个同行业组织中实施为期18至36个月的纵向追踪研究，收集完整的公共维生活动时间占比与操作敏锐度变化的配对数据，检验本文提出的核心剂量-反应假设。

第二，微生成机制研究。通过实验室中的微观行为观察，追踪个体在操作一个需要非语言判断的任务时，不同类型的前置语言指导（具体操作指引 vs. 概念阐释 vs. 无语言指导）如何影响后续的身体执行效率和错误模式。这将有助于在微观认知-行为层面确认语言封装的发生时点与条件。

第三，历史比较案例分析。系统选取历史上那些成功传承了操作性内核的实践传统作为负面案例（例如，某些从未被大规模制度化考核的、以师徒私密传习为主的工艺或武术流派），检验其制度特征是否确实系统性地偏离了本文归纳的三个亚机制。此类负面案例的分析将极有助于划定封装性维持机制的边界条件。

第四，干预实验。在真实的教育或企业组织中，设计并实施一种以现场行为数据流（而非语言汇报）为核心的“第二通道”反馈系统，检验其是否能长期有效延缓或逆转操作性衰退。这类实验将检验本文提出的“改变系统维生燃料”的实践路径是否可行。

第五，跨文化比较。将本文的分析框架应用于与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不同语言-身体关系的其他文化语境（例如，更重视身体性传承的日本传统艺道、或极度依赖文本的犹太法典传统），检验封装性维持机制是否在语言编码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中更为强力，而在保留多种非语言传承通道的文化中相对薄弱。

参考文献

[1] Abrami, P. C., Bernard, R. M., Borokhovski, E., Waddington, D. I., Wade, C. A., & Persson, T. (2015).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students to think critically: A meta-analy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5(2), 275-314.

[2] Chen, L. (2004). *The philosophical transformation of Wang Yangming's doctrine of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3]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 147-160.

[4] Huang, Y. (2015). Contextual change and the fate of classical concepts: The case of zhixing heyi.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42(3-4), 382-399.

[5] Liu, Z. (2010).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Neo-Confucianism: From Zhu Xi to Wang Yangmi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6] Meyer, J.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340-363.

[7] Schooler, J. W., & Engstler-Schooler, T. Y. (1990). Verbal overshadowing of visual memories: Some things are better left unsaid. *Cognitive Psychology*, 22(1), 36-71.

[8] Schooler, J. W. (2002). Verbalization produces a transfer inappropriate processing shift.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16(8), 989-997.

[9] Streeck, W., & Thelen, K. (Eds.). (2005).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van der Kolk, B. A. (2014).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Brain, mind, and body in the healing of trauma*. New York: Viking.

[11] Vergne, J. P., & Durand, R. (2010).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the theory and empirics of path dependence: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testability issue,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7(4), 736-759.

[12] Wang, D. (2019).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education: Fro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competence cultivation*. London: Routledge.

[13] Wang, H., & Li, X. (2017). Institutional alienation and the operational core of educational ideas.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50(3), 189-204.

[14] Zhang, W. (2012).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concept histor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vicissitudes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ideas. *Modern China*, 38(4), 403-432.

[15] Zhou, J. (2019). From embodied practice to textual can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ng Yangming's teach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40(2), 55-89.

[16] Arthur, W. B.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99(394), 116-131.

[17]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8]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 Ryle, G. (1949). *The concept of mind*. London: Hutchinson.

[21] March, J. G., & Olsen, J. P. (1989).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22] Scott, W. R. (2014).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interests, and identities* (4th ed.). Thousand Oaks: Sage.

[23] Suchman, M. C. (1995).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3), 571-610.

[24] Greenwood, R., Oliver, C., Lawrence, T. B., & Meyer, R. E. (Eds.). (2017).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2nd ed.). London: Sage.

[25] Mahoney, J.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9(4), 507-548.

[26] Pierson, P. (2004).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7] Thelen, K.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8] Hacking, I. (2002). *Historical ont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9] Skinner, Q.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 Koselleck, R. (2004).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1] Collins, H. (2010).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2] Ingold, T.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33] Lave, J., & Wenger, E.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4] Nonaka, I., & Takeuchi, H. (1995).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5] Dreyfus, H. L., & Dreyfus, S. E. (1986).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 New York: Free Press.

[36] Flyvbjerg, B. (2006). Fiv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case-study 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2(2), 219-245.

[37] George, A. L., & Bennett, A. (2005).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8] Elster, J. (1989).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9] Hedström, P., & Swedberg, R. (Eds.). (1998).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0]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arge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41] Boudon, R. (1998). Social mechanisms without black boxes. In P. Hedström & R. Swedberg (Eds.),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pp. 172-2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2] Tilly, C. (2001).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21-41.

[43] McAdam, D., Tarrow, S., & Tilly, C.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 Abbott, A. (2001).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5] Turner, S. (1994). *The social theory of practices: Tradition, tacit knowledge, and presupposi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6] Schatzki, T. R., Knorr Cetina, K., & von Savigny, E. (Eds.). (2001).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47] Nicolini, D. (2012). *Practice theory, work, and org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8] Swidler, A.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73-286.

[49] DiMaggio, P. (1997). Culture and cogni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263-287.

[50] Zerubavel, E. (1997). *Social mindscapes: An invitation to cognitive soci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致谢

本文的构思得益于与多位同行在概念史与社会机制领域的持续讨论。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这些意见显著提升了本文论证的清晰度与论证分量。文责自负。